



城乡大转型 时期的思考

CHENGXIANG
DAZHUANXING SHIJI DE SIKAO

中国城市化的回顾与思考 科学构筑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城市体系 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 积极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体制创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体制创新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巨大动力 要加快推
进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步伐 城市开发区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论设市模式与市制改革 省直接领导县：地方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创新 县制也需要改革和完善 市辖市：中国城市型政区设置的法律挑战与出路选择调整村级建制：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再度创新

戴均良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一个大转型 时期的思考

CHENGXIANG
DAZHUANXING SHIQI DE SIKAO

戴均良/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乡大转型时期的思考 / 戴均良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1

ISBN 7-5087-0542-4

I. 城... II. 戴... III. 城乡建设—研究—中国
IV. F2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780 号

书 名: 城乡大转型时期的思考

著 者: 戴均良

责任编辑: 李新涛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20531 (编辑部) (010)66079882 (发行部)

传 真: (010)6602680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542-4/F · 148

定 价: 56.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古人云：“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限于客观条件，这种认识方式有时是有局限性的，因而需要“回头看”辨明真理，修正谬误，以正其行。基于此，笔者从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报告中选取了数篇，汇编成这本文集。由于工作缘由，本文集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思考、城市发展研究和行政区划问题探讨三个方面的内容。

限于政策理论水平，这些文稿大都比较粗浅，虽然也可能有一些思想火花，但并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比如在政治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要求的体会，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主题的认识；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方面，1997年提出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的观点；在行政区划研究方面，关于区划体制改革思路与方向的思考等，或许有一定商榷的价值。但书中的思想都属于个人的理论研究探讨，不是方针政策，特此说明。

人的认识总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因而这些文稿中难免有种种不够科学或不够准确的观点，但为保持历史原貌，结集时没有修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戴均良

2005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1
认清历史发展大趋势 坚定不移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12
坚持“三个代表”必须推进三个创新 /23
深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35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 /43
全面把握和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47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型现代化建设 /53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60
科技创新乃强国之本 /67
官德乃德治之本 /76
20 年民政理论大盘点 /82
深刻认识和理解“两个趋向”重要论断 /90
中国城市化道路和发展趋势 /98

目录
contents

中国城市化的回顾与思考 /109
科学构筑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城市体系 /122
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 /130
积极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136
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体制创新 /14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152
体制创新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巨大动力 /162
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步伐 /170
城市开发区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178
新疆发展中的城市化战略 /191
行政区划 50 年回顾与总结 /202
论设市模式与市制改革 /218
省直接领导县：地方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创新 /230
县制也需要改革和完善 /241
市辖市：中国城市型政区设置的法律挑战与出路选择 /247

- 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 /262
- 特大城市郊县改区改市的利弊分析比较 /273
- 胶东半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调查与思考 /284
- 科学稳妥地做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 /293
- 调整村级建制：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再度创新 /301
- 认真做好行政区划调整规划和论证工作 /310
- 关于大中城市市区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报告 /317
- 统筹发展必然要求创新行政区划体制 /329
- 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要求创新行政区划体制 /336
- 行政区划调整与体制创新的成功实践 /346
- 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整合效益 /358
- 市辖区规模过小问题的调研报告 /368
- 在全局中认识把握和改革完善乡镇体制 /377
- 用科学发展观引导小城镇集约发展 /388
-



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倡导理论创新，指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①。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一定的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一定认识水平的反映，实践没有止境，认识也没有止境，人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因而理论创新是个永恒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创新，需要丰富和发展。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江泽民同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中，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宝贵的启示和指导。

一、推进理论创新最根本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丢掉马克思主义或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坚持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我们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我们主观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党和国家少数几个领导人将个人意志强加于民，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本文公开发表在《学术论丛》2002年第3期，收入学习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的思考》一书。

①→《论科学技术》，第203页，2001年版

由于帝国主义入侵，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千百万仁人志士无数次力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改造中国，但受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制约都失败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为国际上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也不允许在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之后再建立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能是资本主义，这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大众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成果。

中国人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追求全人类幸福的科学，是指导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争得自由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它是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成果，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思想、感情的科学体现。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论，是有史以来最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维护、发展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我们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发展效率，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公平。虽然，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遭受过挫折，但最终是走上了成功之路。而且八十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恰好证明，什么时候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偏离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就会出现失误或失败。



所以，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要出问题。^②

二、推进理论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突破传统观念

理论创新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和已有理论观点的束缚，敢于探索和思考，讲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提过的新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针而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邓小平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④。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应该是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教义式地搬用某些词句；应该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终结或封闭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我党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不是静止地、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得很透彻，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⑤。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关于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论述，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一般而言，所谓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以前所没有的新内容，二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某些与实际不相符的论断。长期以来，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比较容易为马克思主义信徒所理解，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断的修正则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信徒所接收，搞不好还会有“修正主义”之嫌。所以，一般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某些新的思想和观点相对比较容易一些，而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不够科学的结论则要难得多，不仅要有新的理论论断，而且需要更大的理论勇气。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之中或多或少存在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理论观点，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都不可能保证其认识百分之百的正确，更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这种辩证哲学（指唯物辩证法——引者注）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⑦。这个论断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认识，同样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

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始祖对这个问题早已昭示于世，但作为马克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



思主义信徒，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个论断，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决非易事。教条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自不用说，就是很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很难做到这一点。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原因。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但不做理论的奴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某些与实际不相符的理论束缚，甚至修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不符合实际的论断，从而引导实践走向成功。如果没有列宁“一国胜利”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面胜利或多国胜利”结论的修正和完善，就没有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如果没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对列宁斯大林城市中心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邓小平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就没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以，理论创新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三、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学习—实践—创新的紧密结合，三个环节不可偏废

理论创新既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从实践中提高认识，升华理论，又必须注重对现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从现有的理论思想和文化知识中吸取素养。吸取已有的理论素养，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因为理论创新是针对现有理论而言，或有所发展、有所补充，或有所修正，因而对现有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善于学习和利用前人在过去实践中创造的文化遗产，尤其是科学的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首先就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已经提出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新的思想。同时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也应该批判地学习，吸收合理成分。马

克思主义理论从创立之始就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终生都注意学习、吸收他人的优秀理论成果，正因为如此，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直接理论来源。当代世界，社会制度多种多样，生活方式千姿百态，意识形态丰富多彩，社会发展理论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解答世界各国发展进程的一切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又确有许多合理成分。只有注意学习、吸收、借鉴各种学说的合理成分，博采众家之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更丰富、更完善、更有活力，才能更令人信服地领导世界理论园地的时代潮流。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指导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动力，是认识的来源和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推进理论创新必须注重实践，特别是开拓性的、试验性的实践。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对暂时认识不清的东西不搞争论，而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允许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错了就改。这正是实践第一的观点。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是实践的产物。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探索性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善于从实践中升华理论，邓小平也善于从实践中总结规律。实践达不到一定阶段，认识达不到一定水平，理论就得不到新的升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很多内容在改革开放初期提不出来，而只能是经过一段时间改革开放的实践才能形成。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造詣很深的理论工作者提不出来，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邓小平同志，同样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认识，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还没有达到可以产生这一理论的现实条件。

简而言之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指导。理论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产物，一定的理论必然是以一定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但如果没有理论家的提炼总结和创新思维，如果不进行哲学地抽象思



考和概括，理论也就难以产生至少可能会延迟产生。所以，学习—实践—创新，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必由之路，是推动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过程，也是认识升华即理论创新的过程。这也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因为“再实践”、“再认识”必然是在创新基础上的再实践、再认识。

同时还要强调的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会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四、推进理论创新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从失败和失误中反思出正确的认识

如上文所述，实践是理论形成的根本条件，但一切理论的形成，同时也离不开理论工作者，尤其是理论大师们的思考、总结和概括。成功的实践无疑是科学理论的直接来源，失误的实践也可以为科学理论的产生提供契机和反证，甚至许多重大理论成果的形成正是在重大失误的基础上形成的。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可以成为正确的先导，关键是要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出新的实践获得成功的正确途径。在这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杰出的楷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大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都与毛泽东、邓小平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分不开。正是在总结1927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起两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和理论，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此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

的规律”^⑧。同样，正是在总结1958年以后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⑨，“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⑩。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两起两落的经验教训，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改革开放前20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但是，仅有实践的经验教训还不够，如果不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特别是如果没有人站在时代的前头指点迷津，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是不能产生新的科学理论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基本的素材，但如果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善于从成功与失误的比较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就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形不成科学的理论。事实上，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的不少领导人并没有从失败中及时醒悟过来，而是仍然坚持王明的“左”倾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同样有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不清，包括当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对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并没有深刻清醒的认识。而毛泽东、邓小平则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及时总结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指出了革命和建设正确的道路。所以，善于对失败和失误的教训进行总结反思，也是理论创新取得成果的重要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曾深刻指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

⑧→《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



五、推进理论创新要善于洞察和把握时局，使思想认识及时反映时代要求和时代特征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时代特征的体现和反映。所以任何理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都只能反映出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水平。而新的理论则只有反映新时代的要求，体现新时代的特点，才会应运而生并赋有生长的生命力。因此，能否认清发展变化的形势，把握时代的脉搏，高瞻远瞩时代发展的趋势，是能否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正是马克思、恩格斯透彻地认清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局和发展的趋势，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得益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新的贡献，也同样得益于邓小平对新形势的新判断，从而引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结论。如果“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仍然是阶级斗争占主导地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仍然是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那就不可能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对形势和时局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正确决策、正确理论形成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如果熟视无睹，就不可能形成新的认识境界。理论创新要求认识和把握时局敏锐而科学，在早已变化了的形势面前麻木不仁、迟钝不清，就不可能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

洞察和把握时局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时局，越到现代社会越是如此。因为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际空间大大缩小了，国家间彼此的制约与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说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更多地注重了国情特点，那么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和“四个如何认识”思想，则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这是因为近年来受信息化、全球化的影响，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比20年前更为复杂，今天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度较之20年前要高得多，必须更多地在世界大格局中考虑中国的问题。

六、推进理论创新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当代中国，理论创新要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主题展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实践的要求，现实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论述得最为充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而言薄弱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但如何把这个必然性变成现实性，特别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是列宁也没有真正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描绘出大概的设想，列宁对苏联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更具体更丰富的思想，但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形成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飞跃性的升华，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这并不是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全部解决了，实际上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说，公有制如何科学有效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要在实践上进一步完善，而且也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清楚。

更主要的是，我们是在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与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对国情的基本判断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